

#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

[美]卡伦·霍尔奈著  
张承谟 贾海虹译

当代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65

**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

上海文艺出版社

**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

---

(美) 卡伦·霍尔奈著 张承谟 贾海虹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夏青根

封面设计：王志伟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

〔美〕卡伦·霍尔奈著 张承漠 贾海虹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海峰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10,000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1517-8/B·10 定价：18.40元

## 中文版前言

卡伦·霍尔奈(1885—1952)是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她曾在格廷根的弗赖堡大学和柏林研究医学,1910年开始与卡尔·亚伯拉罕共同从事精神分析,并成为于1920年建立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创始人之一。20年代至30年代初,她在固守传统理论框架的同时,开始尝试修正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观点。她的论文因远远超越了时代而未得到应有的注意,但自1967年《女性心理学》重版后,卡伦·霍尔奈已被公认为首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者。

1932年,霍尔奈接受弗兰茨·亚历山大邀请,到新成立的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副主任。1934年迁往纽约,加盟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期间,她受到美国新的知识与社会思潮的影响,出版了两本著作——《当代的神经质人格》(1937)和《精神分析新法》(1939)。书中摈弃了一些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前提,不再强调其理论的生物学取向,而以文化、人际关系的强调取而代之。这些书大大惹恼了霍尔奈正统保守的同事们,她被迫辞职,离开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在她思想的第二阶段,霍氏与同为新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哈里·斯达克·沙利文、埃里克·弗罗姆、克拉拉·汤普森、亚伯拉罕·卡迪纳合作进行“文化学

派”的精神分析。

离开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后,霍尔奈于1941年创建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在此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发展了她的“成熟理论”。《自我分析》(1942),《我们的内心冲突》(1945)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中,她提出人们为解决因感到不安全、不被喜爱、无价值而产生的焦虑,否认自己的真实情感,精心设计出防卫策略,这种策略既是人际的,又是心理内部的。

卡伦·霍尔奈的思想演变可分为数个阶段,因此她对不同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有人认为她首先是位在反弗洛伊德女性心理学观点的运动中起重大推动作用的女性,另一些人认为她是新弗洛伊德主义“文化学派”的一员,还有一些人则以为她的主要成就在于“成熟理论”,该学说完善了防卫策略的复杂分类。尽管霍氏思想的每一阶段都很重要,我觉得成熟理论代表了她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最大贡献。她早期的大多数观点已被她本人或别人修订、丰富;另一些则被后人重新发现、吸收。《我们的内心冲突》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对人类行为中现存的内心冲突及防卫情意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有力解释。这不仅在临床实践上,而且在文学、文化、政治心理学、哲学、宗教、传记、性别等领域的研究中都有巨大的价值。

霍尔奈的每本著作各有独到之处,值得重视。其中《神经症与人的成长》是她最重要的作品。该书以霍氏早期论文为基础,加入大量新内容而成。霍尔奈作品以清晰明了著称,《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亦不例外。但对不太熟悉霍氏观点的读者,以下的介绍能让您更好地理解该书。

## 1. 霍尔奈与女性心理学

当霍尔奈还是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一名讲授正统理论的教师时，她开始反驳弗洛伊德关于阴茎嫉妒、女性受虐狂和女性发展的学说，并试图用站在女性立场的观点去取代当时流行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心理学观。虽然起初她尝试从内部去修正精神分析学说，最终她还是向这一学说的许多前提条件提出挑战，继而发展了她自己的理论。

在霍尔奈最早的两篇女性心理学论文——《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1923)和《逃离女性身分》(1926)中，她努力说明女孩与妇女有固定的生理构造和成长方式，应从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它，而非仅仅从她们不同于男子且认定她们劣于男子之处来考虑。她指出，精神分析学说之所以认为妇女是有缺陷的男子，是因为该学说乃一位男性天才(弗洛伊德)和一个男权统治社会的产物。如果精神分析学说只从男性视角看女性，就不能说它是对妇女天性本质的科学描绘。霍尔奈的疑问是：男子为什么会这样看待妇女？她认为，男子对于怀孕、生产、母亲身分、乳房以及吮吸的嫉妒，使他们无意识中产生贬低妇女的倾向；男子对富创造性工作的冲动是他们对自己在繁衍后代工作中所起微小作用的过度补偿。男子“子宫嫉妒”一定比所谓的女性“阴茎嫉妒”更强烈，因为男性需要贬低女性更甚于女性贬低男性的需要。

后来的论文中，霍尔奈继续分析男性的妇女观，暴露其缺乏科学依据之处。在《两性之间的不信任》(1931)中，她提出妇女被视作“二等女人”，因为“在任何时代，强大的一方会创造有助于保持它地位的意识形态”，且“在此意识形态下，弱方与强方的不

同之处被解释成为劣处”。《害怕女人》一文将男子对妇女的恐惧追溯至男孩害怕自己的生殖器无法胜任与母亲的关系。来自女性的威胁并非阉割,而是羞辱,是对他“男性自尊”的威胁。长大后,男性始终有深深隐藏的关于他阴茎大小或性能力的焦虑。女性身上却没有对应的焦虑。她“只按照存在的方式去扮演角色”,不被强迫去不断证明女性身分。因此也就不存在相应的女性对男性的恐惧。男性应付这种焦虑的对策是树立“有效率”的形象,寻求性征服和贬低恋爱对象。

霍尔奈不否认妇女常常妒忌男性并对自己的女性身分感到不快。事实上,她的许多论文均涉及“男性气质情结”。在《被抑制的女性情结》中,她把“男性气质情结”定义成“有关女性感到被歧视,她对男性的嫉妒,她期望成为男性,抛弃女性身分的一切情感、幻想的情结”。虽然最初她提出妇女为男性气质情结束缚是因为她们需要逃离俄底浦斯处境下产生的焦虑与罪恶感,但霍尔奈很快发现男性气质情结虽不可避免,可它是男性统治文化和特定家庭推动力的产物。事实上,女孩从一出生就被或小心或粗暴地暗示她劣于男性,此种体验“不断地激发她的男性气质情结”(《逃离女性身分》)。

讨论家庭推动力时,霍尔奈起先着眼于女孩和男性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但后来,母亲成为妇女“男性气质情结”发展中的核心人物。在《母亲的冲突》(1933)中,她将以前论文里提及的一些导致男性气质情结的童年时代特征加以归总:“一个女孩可能很早就有理由讨厌她所处的女性世界,这可能是由于母亲吓唬她,或凭经验她对父亲兄弟彻底失望,不抱幻想;也有可能是她的早期性经历令她恐惧;或她发现兄弟比自己更得宠爱。”所有这些都曾发生在卡伦·霍尔奈的幼年时代。

霍尔奈有关女性心理学的论文彻底脱离了弗洛伊德“解剖构造即命运”的信条,强调文化因素是女性问题及其性别定位的重要诱因。妇女羡慕的并非男子阴茎,而是男性特权,她们需要更多机会发展作为“人”的能力。家长的理想未必与她们的天性一致,但这种理想的文化力量却常使她们能在行为上与其一致。《女性受虐狂问题》一书中,霍氏向“受虐狂是天生的,或至少与妇女的天性相近”的观点发出质询。此种精神分析学的立场反映了陈旧的男性文化观,但她又指出,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使妇女比男性更易成为受虐狂。进一步说,比较研究表明这一类社会条件普遍存在,有些社会比另外一些更不鼓励妇女的发展与提高。

尽管霍尔奈将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投入了女性心理学的写作,她仍于1935年放弃该选题。因为她感到,文化在女性心理形成中的角色令她无法确认哪些心理为女性特有,哪些不是。在名为《女性害怕行动》(1935)的演讲中,她指出,只有当妇女从男性统治文化中所定义的女性观中解放出来后,我们才能真正地区分妇女与男子心理上究竟有何不同。我们的首要任务不应是探讨“女性本质”,而应推动“整个人类人格的完善”。从此之后,霍尔奈开始发展她认为中性、对两性同样适用的理论。

## 2. 霍尔奈与弗洛伊德的决裂

30年代,霍尔奈出版了《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与《精神分析新法》两本著作,以致她实际上被逐出精神分析学界。书中,她对弗洛伊德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方法。

当时,霍尔奈思想的主导特征之一是强调文化在神经质防御与冲突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在有关女性心理学的论文



中进一步阐述了文化的重要意义。侨居美国后，霍尔奈体会到美国文化与中欧文化之不同，她更能够接受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化取向较浓的精神分析学者如埃里克·弗罗姆、哈拉德·拉斯韦尔、鲁思·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及哈里·斯达克·沙利文等人的影响。

霍尔奈指出，弗洛伊德由于过分强调人类行为中的生物学因素，以致他将自己所处文化氛围中较为普遍的情感、态度和人际关系不正确地推而广之。他没有认识到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将神经质的自我中心归因于自恋力比多，将敌意归因于破坏本能，将对金钱的着迷归因于肛欲力比多，将贪婪归因于口淫欲。人类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在以上性格特征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有很大区别。霍尔奈坚持马林诺夫斯基的看法，认为俄底浦斯情结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条件反射，可以通过社会的修正得到减轻。

霍尔奈摒弃了弗洛伊德“神经症起源乃文明与本能之冲突”的说法。弗氏以为，我们为生存必须有文明，为有文明必须压制或升华本能。因为快乐来自本能迅即的、完全的满足，我们就必须在生存与快乐之间作出抉择。霍尔奈不相信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冲撞不可避免。发生冲撞是由于不利的环境阻碍我们情感的需求，导致恐惧与敌意。弗洛伊德把人类描绘得天生无法满足，具毁灭性与反社会性；但据霍氏的看法，这些特征只是对不利环境的神经质反应，而非本能的流露。

霍尔奈常常首先被看作“文化学派”的一员。其实，对文化的强调只是她思想历程中的一章。30年代，她著作中更重要的特征是最早出现在《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中的神经质构成的新观点。霍尔奈并未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忽略童年时代在感情成长中

所具的重要意义,但她认为致病的原因不是力比多受挫,而是家庭中让儿童感到不安全、不被喜爱、不受重视的因素。这些因素导致儿童“基本焦虑”的形成,令他们在这个潜藏敌意的世界里倍感无助。随后,他们试图采取一些防卫措施,如追逐爱情、权力或超脱,来克服焦虑。不是每个人都能与这些防卫措施协调适应,于是内心的冲突又引发新的障碍。霍氏在后来的著作中继续发展提炼此种神经症形成观。

霍尔奈感到,我们的防卫措施导致恶性循环,因此注定失败。恶性循环中,我们用以平息焦虑的方法恰恰使之增长。例如,一个人对爱的需求在受到阻碍时会变得更强烈,随之而来的苛求与嫉妒却使他比以往更难得到爱。从未被爱过的人会产生一种不可改变的想法,认为自己不可能被爱,因为他们不相信爱的表示,而且走向极端,以为任何爱的给予都出自别有用心动机。丧失爱会使他们依赖别人,他们又十分害怕依赖,因为这使他们分外脆弱。霍氏将这种情形比作“一饿汉害怕食物有毒,所以不敢吃任何东西”。

霍尔奈的《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主要讨论对爱的神经质需求,同时着重研究人因无望获得爱而产生的对权力、名望、财富的渴求。对此类目标的追逐是焦虑、愤怒和自卑感的产物。神经质的人永不满足,因为无论怎样的成功都不能使他们感到安全、有保障或对已有的成就满意。如果对爱、成功的需求不是在强迫的形式下体验到的,他们就成为温厚的、可具满足感的人。

根据霍尔奈的观点,人们为解决基本焦虑,采取多种而不是一种防卫措施。他们可能“同时被驱使去设法统治每个人又想为每个人所爱,服从别人又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想要离群索居又渴望别人的爱慕”。结果,他们被不可解决的冲突(通常也

是神经症的根源)百般折磨。

霍尔奈的早期著作阐述了神经症的构成：人际关系的困扰引起基本焦虑，焦虑导致防御策略的形成，而防御策略又是有违初衷、相互矛盾的。《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一书主要讨论对爱和权力的追逐，同时提及超脱；《精神分析新法》中，霍尔奈将自恋癖和完美癖加入人际关系策略一栏。这些著作中她还介绍了一些心理策略，如自命不凡、自责、神经质折磨、过分循规蹈矩，但在最后两本著作前，她并未对此作出深入的阐述。

也许霍尔奈在精神分析新观点上的最杰出之处即在于她研究重点的不断转移——既在理论上也在临床实践上，既研究过去的也研究现在的。她试图以“构成观”取代弗洛伊德对“起源”的重视。她认为精神分析应对当前的防卫及内心冲突情意丛多加关注，不要太注重婴幼儿期起源。该特征是霍氏理论与传统精神分析法的分水岭，也使她的观点难以被着眼“过去式”的人所接受。

霍尔奈在《精神分析新法》一书中把她的“进化论”思想和她称之为“机械进化论”的弗洛伊德思想加以比较区别。进化论观点认为“事物今天的存在方式不与它们最初的存在方式完全相同，但从早期阶段演变而来。早期阶段与现阶段的形态可能并无多少类似之处，但如果没有早期的形态，今天的形态也就无从而来”。机械进化论思想以为“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东西”，“我们今日所见只是旧瓶装新酒”。对霍尔奈而言，早期经历的深刻影响不能阻止以后的发展，弗氏则认为五岁以后就没有任何新鲜东西，尔后的反应或经验仅被看作对早期的重复。弗洛伊德机械进化论思想在他有关潜意识永恒性、重复强迫症、倒退、移情的论述中得到充分表达。霍尔奈称之为“用过去解释

现在,用婴儿期来表明当前趋势”。

潜意识永恒性是弗洛伊德学说中关于儿童期经历与成年后行为之间关系的中心点。儿童时期受到压制的恐惧与欲望,乃至整个经历,在成长过程中不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此观点导致固恋概念的产生。固恋是指心理上从属于早期环境中的某个人(如父亲、母亲)或力比多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根据固恋的观点,成长后的爱慕或其他行为仅仅是对过去的重复而已。

霍尔奈从未尝试驳倒潜意识永恒性的信条及与其相关的大量概念,但她却在不同的前提条件下建立起自己的理论。“非机械论观点认为生物体发展过程中绝无对前期阶段的简单重复或倒退。”现在总包容着过去,但过去存在于发展的过程之中,而不是重复里。霍尔奈说,生命能够“真正完善”的方式即在于“每一步骤都为下一步骤提供了条件”。因而,“那些将当前难题与儿童时期影响迅速联系起来的说法在科学上只是真伪参半,在实践上更毫无用处。”

霍尔奈模式中,早期经验对我们的深刻影响不是产生固恋,从而不断重复过去的行为方式;它影响我们建立处世的方式。反过来它又被后来的经验所影响,最终演化出我们成年后的防卫措施及性格构架。早期经验决定发展的方向,因此与后期经验相比可能有更大一些的影响,但成年人的性格是所有先前的心理构成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得的产物。

霍尔奈与弗洛伊德的另一不同之处是,弗氏学说中具决定意义的儿童期经历在量上相对较少,且大多与性欲有关;霍氏以为儿童期的整个经历乃神经症发生的缘由。由于社会文化的因素,与伙伴关系的因素,特别是家庭中令儿童感到不安、不被喜爱、不受重视的因素会引起基本焦虑,产生病态,上述不利状况

导致了特定性格构架的发展,这种性格构架又引发日后的麻烦。

当前状况与儿童期确有关联,不过霍尔奈以为溯源极其困难复杂。她称试图寻找儿童期起源来理解病症的方法是“努力用毫无所知的东西解释知之甚少的东西”。她说“重视那些真正驱动或压制一个人的力量,更为有益;依此方法即便对童年期经历了解无多,也可以有合理的机会来解释病症”。

### 3. 霍尔奈的成熟理论

从《精神分析新法》一书开始,霍尔奈将神经症的中心特征看作因环境中压抑的力量而产生的对“自然本我”的扭曲。治疗的目的是帮助病人恢复自我,重获自发性,并找到自己的重心。霍尔奈在一篇名为《你能固守立场吗?》(1939)的论文中提出“真实的自我”这一术语,后于《自我分析》(1942)中再次提到,并首次采用“自我实现”的说法。《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开篇霍尔奈即对健康的人格发展与神经质的发展进行比较区分,前者个人能意识到他们的潜能,后者人们则与真实的自我疏离。该书副标题为“实现自我的奋斗”,她的真实自我概念既是对健康心理也是对神经症认识的基础。

真实的自我并非一成不变的存在,它是整套“内在的潜能”——包括气质、才智、能力、禀性等——这些都是我们基因组的一部分,而且需要有利的环境来培养发展。它不是学习的产物,因为没人能被教作自我;但它亦非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它是在能够提供多种发展途径的外部世界中通过相互作用得到实现的。人们能够在不同的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自我。尽管如此,婴幼儿期的某些特定条件是每个人实现自我必不可少的。能使儿童表达自己思想与情感的“温暖氛围”,对儿童

各种需要的善意满足，以及与周围其他人“愿望和意志的正常摩擦”皆属此类。

当父母由于神经症不能爱孩子，甚至不将他视作“具有独立性的人”时，孩子会产生基本焦虑，阻碍他“自发地以真实情感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迫使他寻找方法应对”。这时孩子的感情和行为已不纯粹是自我的表达，而被防卫策略左右。

霍尔奈的成熟理论描述了这些防卫策略，将它们归总入精密的分类。《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中，她致力于人际关系策略及导致其产生的矛盾根源；而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她对心理防卫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解说，并把它与人际关系策略结合——虽然结合得不甚完美。

霍尔奈于《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向“只重心理或人际关系因素两者之一”的做法提出警告，认为神经症可被理解成为“只是一个过程，此过程中人际关系矛盾导致特定的心理完形，后者反过来又依赖于并修正旧有的人际关系模式”。与此同时，她又漠视自己的警告，过分强调心理因素。这就给读者出了难题。因为人际关系矛盾导致心理完形，所以最为逻辑地展示她理论的方法应从人际关系开始。《我们的内心冲突》中她是这样做的。可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她急于表述最新的观点，首先讨论了心理策略，有时甚至将人际关系的解决追溯至心理原因，以致造成一些观念的混淆。这里我将她最后两本著作中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澄清混淆，使《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一书更易理解。

为了克服导致产生基本焦虑的不安全感、不被喜爱感和不受重视感，人们可能采取顺从或自我谦避的方法迎合他人，可能以攻击或自负的方式对抗他人，也可能变得超脱、与世无争，远

离人群。霍尔奈在《我们的内心冲突》里采用前一组说法（顺从的、攻击的、超脱的），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则采用后一组（自我谦避的、自负的、与世无争的），其实这些倾向通常都交替发生。健康人能在三种取向里灵活变通地转移，但对自我疏离的人，转移是强迫性的，不加区分的。每种解决方法都包含有行为方式、个性特质的萃集，正义观及有关人性、人类价值和人类状况的整套信念，同时还包含与命运的一笔交易，依从该方法被认为可获回报。

在不同的防卫转移中，涉及基本焦虑的某一因素被夸大了：如顺从方法中的无助，攻击方法中的敌意，超脱方法中的孤立。由于产生基本焦虑的状况必然会滋生以上所有三种情感，个人就必须同时作出三种防卫转移；又由于这些转移涉及各不相同的性格构成和价值体系，他们就会被内心冲突所折磨。为获得某种完整感，他们会强调某一类转移强于其他，成为主导性格或自我谦避，或自负，或超脱的人。性格和环境因素在他们各自情形中的特有结合则决定他们强调哪种转移。

其余的倾向依然继续存在，它们潜意识地在伪装下以迂回的方式得到表现。不同转移间的矛盾虽无法解决，但可以简单地转入地下。当被湮没的倾向由于某种原因渐进表面，个人会体验到严重的内心骚动甚至瘫痪，根本无法作出任何一种转移。在某种强大影响的推动下或由于主导解决方法的戏剧性失败，他们可能会采用原先被压制的另一种防卫策略。他们把这一过程体会为转换或教育，其实它只是一种防卫对另一种的替代。

顺从趋向为主导的人试图通过获得爱与赞许，通过使他人需要自己，以此控制他人的方法，去克服基本焦虑。他们表现“善良、有爱心、谦恭、柔弱”以使别人伴随自己。由于他们有让

步的需要,有安全表达攻击倾向的需要,因而常常会被具有相反性格的人吸引,通过自负的人替代地实现对生活的主宰。这种关系会发展成“病态依赖”,一旦顺从的一方开始感到他们牺牲自己作出的让步并未得到回报,就将产生危机。

顺从型人价值观基于“善良、同情、爱心、慷慨、无私、谦卑的导向,憎恶自负、野心、冷酷、无道德原则、主宰欲”。因为任何期望,任何奋斗,任何试图得到更多回报的做法对他们都如同“向命运提出危险轻率的挑战”,他们被严重地压制于孤行专断与自我保护行为之下。他们笃信基督教的价值观,但却是在一种强迫性的方式下,因为这种价值观是他们的防卫系统必需的。他们一定信奉若有人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伸给他;他们必然以为在这世界上苍自有安排,美德将受回报。他们的交易是,如果他们做平和、有爱心、回避骄傲、不求荣誉的人,就会被命运和他人善待。如果交易不成,他们或会对上帝的公正绝望,得出结论自己是有罪的一方,或求助于另一种公正信仰,它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力。他们不仅要相信世俗的公平原则,而且要相信人性之善,也恰是这一点,会令他们容易失望。

霍尔奈说,顺从型人“有各种攻击倾向被严重压制”。感受或实施这类倾向与他们的行善愿望会发生强烈的冲撞,危害他们获得爱、公正、保护和赞许的整套策略,因而只能被压制下来。顺从策略往往会增大他们的敌意,因为“谦恭和‘善良’引来他人粗暴的对待”,“对别人的依赖导致异常的脆弱”。但他们内心的愤怒威胁到自我形象、生活哲学、他们与命运的交易,他们必须压制、掩饰、调整他们的愤怒,避免产生自我憎恨和对他人的敌意。

自负倾向占主导的人与自我谦避型人有着完全相反的目的。



标、品性和价值观。最吸引他们的不是爱，却是主宰。他们憎恨无助，因痛苦而感羞耻，需要成功、声望与认知。如前所述，《我们的内心冲突》中的顺从、攻击和超脱方法到《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演变为自我谦避、自负和与世无争。霍尔奈将自负的方法分为区别显著的三类——自恋的、完美主义的、傲慢—报复的。因此现在就有了五种主导解决方法。《我们的内心冲突》未论及自恋和完美主义，该书所讲的攻击性方法即《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的傲慢—报复方法。

自恋的人试图藉“自我崇拜，魅力的训练”来驾御生活。他们通常是受到宠爱的孩子，天赋高于常人，成长过程中感到世界就像充满爱心的母亲，自己则是命运的宠儿。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极有信心，以为自己战无不胜。事实上，他们可能不停地谈论自己的功绩和杰出品质，不断地需要用别人的爱慕和忠诚来确认他们对自我的评估。这正暴露了他们的不稳定感。他们的交易是，假如他们能固守自己的梦和夸大的自我估价，生活将赐给他们一切所需。若事情并非如此，他们就会经受心理崩溃，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面对现实。

完美主义者有非常高的道德和智力标准，在此基础上他们藐视别人。他们为自己的操行端正深感自豪，生活中追求“完美无瑕”。由于遵守他们的这种标准十分困难，他们常常将懂得道德价值观与做个好人混为一谈。一方面他们以此方法欺骗自己，另一方面却坚持要求别人遵守这种标准，并因别人做不到而鄙视他们，从而将自己的自我谴责外表化。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的做法使他们对极少数通过选择的人充满崇敬，而以苛刻的或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人类中绝大多数。完美主义者有笔原则至上的交易，公平、正直、尽职使他们有资格要求获得“别人及